

新论点
丛书

政法社会学 论点选编

(1978年底—1987年初)

《新华文摘》编辑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07
X57

297364

新论点丛书

政法社会学论点选编

(1978 年底—1987 年初)

《新华文摘》编辑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 论 点 丛 书
政法社会学论点选编
(1978年底—1987年初)
《新华文摘》编辑部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北京丰台岳各庄)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开本: 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 5.75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18 000 册数: 1—10 000

*

ISBN 7—300—00200—5/D·19
书号: 6011·144 定价: 1.10元

编 选 说 明

为了积累和交流信息、促进学术理论研究，特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这套丛书共有7本：政法社会学类、哲学类、经济学类、历史学类、文艺理论类、文化教育类和科学技术类。这些论点，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创刊的《新华文摘》第1——100期的“论点摘编”中，筛选、精编而成的，从中可见我国1978年底至1987年初学术理论研究成果之一斑。由于“论点摘编”旨在选摘论点新颖之作，因此，公认的传统论点，这里没有反映；而且有的只是一家之见，并不是什么定论。又由于刊物篇幅和编辑视野所限，因此所收论点很可能会有重大的遗漏。我们的编选宗旨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双百方针”的前提下，尽量选用内容新颖、见解独到、有保留和交流价值且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论点。我们的具体编选工作可能难以完全做到这一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我们要感谢被摘论点的论文作者和有关报刊，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这套丛书凝聚着我们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先后调离的同志）的辛劳，它也算是给《新华文摘》出版百期留个纪念。

《新华文摘》编辑部

1987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与原理	(1)
二	科学社会主义	(21)
三	政治体制和政治工作	(47)
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66)
五	政治学	(73)
六	法的理论	(85)
七	宪法·刑法	(104)
八	民法·经济法·行政法	(112)
九	社会学·民俗学	(126)
十	婚姻·家庭	(136)
十一	人口学	(147)
十二	民族学	(161)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著作与原理

如何理解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口号

30年代初期和中期，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两个口号引起过广泛的议论，有的认为前者只重视技术忽视政治，后者只重视干部轻视群众，应予否定。曾汉祥、任大奎在《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3期上撰文认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其所起的实际作用加以分析，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对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口号应基本予以肯定。

文章认为，当时苏联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必须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新技术和先进设备来改造和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使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不少领导干部和经济工作人员却不懂得掌握先进技术的重要，鄙薄技术工作，甘当外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于1931年才及时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首先说明这个口号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作用；其次，他把能否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状况提高到关系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和对世界无产阶级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的高度，这难道是忽视政治吗？再次，由于这个口号抓住了问题的中心环节，促进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九个月完成。

由于上述成就的取得，到1935年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又突出出来，即能驾驭技术的干部增加速度远远落后于技术增长的速度，而且很多人还过高估计技术，这时斯大林又及时提出用“干部决定一切”的新口号来代替“技术决定一切”的旧口号。但他在强调干部的决定作用时并未轻视群众的作用，如他高度重视和热情赞颂斯达汉诺夫运动，在他支持和倡导下很快形成了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在这一口号的推动下又促进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取得了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事业的巨大胜利。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究竟怎样论述“不断革命”？

有的同志认为：“‘不断革命论’，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1850年3月至6月间，由于形势、革命实践和认识等方面的原因，偶尔使用过‘不断革命’，这一字眼，以作为对其他派别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种必要的妥协”，以后就“抛弃和否定这一提法了”。列宁也只是“在1905年革命期间”，“偶尔有一次使用过‘不断革命’字眼”，但他“随着革命实践、特别是反托洛茨基‘左’倾思潮斗争的发展，对于‘不断革命论’，便采取了明确而坚决的否定态度”。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实践中，也曾特别注意同‘不断革命论’划清界限”（见《争鸣》1981年第1期：《“不断革命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吗？》）。这样一来，“不断革命论”就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一笔勾销和全盘否定了。高春初在《争鸣》1981年第3期上撰文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

因而不能同意的。

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就已提出：“革命是不停顿的”。1850年3月在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则明确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说：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1850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没有提不断革命问题。列宁进一步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与区别、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1905年革命前后和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都明确肯定这些论断，并非偶尔使用。毛泽东同志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个不同阶段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应该充分肯定，不能一笔勾销。对“不断革命论”采取简单否定和坚决抛弃的态度是不科学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应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

关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认为，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宗玛丽在《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6期上撰文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第一，根据史实，《共产党宣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第一部系统著作。在《共产党宣言》问世以前，它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并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指

导工人运动。在1845—1846年，他们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系统阐明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并同时开始以科学共产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指导着工人运动。第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应以其基本思想的形成为准，而不应以体系形成为据。第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追述中，可以看到，早在1845年他们就对自己以前的信仰作了清算，而这个清算的结果，就凝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时间应在1845年，具体标志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首先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是只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其次，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从而首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再次，论证了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综上所述，可以证明，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6年开始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则没有《共产党宣言》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应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彻底转变”论不能成立

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已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赵常林在《河北师

院学报》1982年第3期上撰文认为“彻底转变论”不能成立。

判断一种哲学思想的性质必须根据它如何解决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判断一种哲学思想是否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根据它是否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根本没有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更谈不上从它们出发去说明历史了。物质生产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考虑之内。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基本上是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上的。主要表现：一、从人出发去说明国家。二、从人出发去说明宗教。三、从人出发去论证革命。四、从人出发去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保存着理性决定世界的思想，认为理性是世界的本质，把宗教、国家等看成是理性的非理性表现形式。强调思想要极力趋向现实，现实也要趋向思想。他并没有把人本主义思想和理性决定世界的思想对立起来，而是赋予理性以人本主义的内容，把人是最高的本质这样一种理论看成是理性。马克思明确地把人本主义与理性决定世界对立起来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那里他有意识地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过程是一个自然的客观的过程。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揭露了理念或自我意识决定历史这样一种唯心主义观点的认识论根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露了这种观点的社会历史根源，并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而且，“彻底转变论”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述相矛盾的。

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

坚毅在《上饶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马克

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学术界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二是以1852年马克思给约·魏德迈的信为标志，三是以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发表为标志。上述三种意见都有可取之处，但都存在着片面性。其实，任何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都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9月到1846年夏初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又写了《哲学的贫困》。在这个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而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联合体。这说明马克思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经萌芽了。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要点，但尚未形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在《1848年的六月失败》中第一次使用了工人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在3月和4月又再次明确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在1851年—1852年，马克思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提出了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理。在1852年3月，马克思给约·魏德迈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三点的贡献。到这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基本上形成了。

1871年5月，马克思写了《法兰西内战》，及时地分析和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最后解决了无产阶级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到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完全创立和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马克思对工业较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 革命可能性问题的研究

长期以来，在理论界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根据工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欧美先进国家的条件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发生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张式谷、章显培在《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上撰文认为，这是对历史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时所涉及的既有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也有工业较不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指出工业不发达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所说的条件和途径主要是指：一、近代大工业产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是这类国家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条件。二、具有高度觉悟和高度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工业较不发达国家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的国内条件。三、工农联盟是工业较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内条件。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只有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间站”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有的同志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反复指出，只有大工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的时候，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认为工业较不发达、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达到极端地步的国家，也存在着

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呢？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只有大工业的高度发展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观点，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才使科学社会主义同那些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学派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但是，坚持这个观点同承认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认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的辩证的理解。

马克思关于“中间环节”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设想

李金奎在《湘潭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马克思在分析比较工业发达的英国和工业不发达的欧洲大陆各国的情况时：一方面认为，从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剖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必然性；具有普遍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每个国家的革命实践都必须从各自的国情出发，不能一刀切。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和书简中，多次谈到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从资本主义向完全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不可能不采取必要的中间环节。

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成功地运用了这个原理，利用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等，使俄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两种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的革命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建国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个社

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应当指出，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上，虽然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还低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但必须看到，我国早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便已具有了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生产力。虽然现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辉煌的成绩，也决不能忽视在现阶段整个生产力状况的多层次性。因此，我国在向完全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采取适当形式的中间环节就成为十分必要。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一、在考察社会化生产力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时，不能孤立地、简单地着眼于社会化生产力的数量指标，而应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内，具体分析，特别要在先进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并存状况中充分估计先进部分的决定性作用。二、一个原来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基本结束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后，仍然需要利用“中间环节”才能发展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类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曾达到足以使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变成单一的社会公有制的高度。如果在条件不成熟时实行“人为的”过渡，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三、不应把“中间环节”仅仅理解为一种形式和一个系列，它可以是多种形式和多个系列。四、肯定“中间环节”的必要性，也就意味着承认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长期性，因而又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可以划分阶段，包括由“不完全”到“完全”，或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这在理论上的意义是，既可以区别于“过渡时期”，又可以划清“自我调节”与

“不断革命”的界限，从而避免导致“左”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还应是《共产党宣言》

赵佐良在《国际共运》1983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近年来在学术界有人提出应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根据史实，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时尚未发表，以该书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无实际意义。二、以列宁生前没有见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理由，否定《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论据也是不足的。列宁把《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说法为根据的。三、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或者说基本观点的形成，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应有一个历史过程，它的基本观点也有一个成熟的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详尽地论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它还没有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所以，还不能说它是一部“系统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代表作”。四、还有这样一个理由，“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之前已形成，否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什么思想在1845年—1848年间，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并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进行斗争呢？”这一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仍然是《共产党宣言》。根据是：一、《共产党宣言》是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马

克思主义的名著。二、《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它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了。三、《共产党宣言》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纪元。

不断革命真义是持久革命

近几年来，有些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把不断革命的概念，始终只用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它仅仅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一种策略。朱桂谦、绍平在1985年第1期《湖南师大学报》撰文指出，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把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要热情支持和尽力推进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英特纳雄耐尔”。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内容是丰富的，绝对不能说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概念，“都始终只用于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上使用过它”。如果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上述的政治革命，那么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变成了一次革命论；或者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要继续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不断革命只是指政治革命。“不断革命”，德文、英文原意都是“持久革命”。我国中译本沿用俄文版的译法，也译成了“不断革命”。马克思说过，持久革命要持续到实现四个“达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要“整整一个时代”，即“社会革命的时代”。这样，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虽以政治革命为起

点，但比政治革命范围要广泛得多，内容要丰富得多，时间要长得多。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断革命斗争的过程，也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我们应该坚决摒弃“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正确坚持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

恩格斯并未批判《爱尔福特纲领》

有的辞书和著作在解释《爱尔福特纲领》时，认为恩格斯著文批判了《爱尔福特纲领》。关勋夏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上著文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恩格斯的《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所批判的，不是1891年10月14—20日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也不是执行委员会已经考虑过恩格斯某些意见，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改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草案》（即最后的纲领草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草案》），更不是考茨基的《新党纲草案》，而是李卜克内西“按照哥达纲领的样子粗糙地制订的”党执行委员会的最初草案。我们应该正视在制订《爱尔福特纲领》过程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严重斗争的事实，以避免造成谬误。

列宁并没有明确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王惠保在《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上撰文提出，列宁在1915年提出，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指的是一国可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不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在此以后，